

※ 文哲論壇 ※

以不錄批朱——試就〈二南〉論赤松太庾《詩經述》對朱熹《詩集傳》的無言批判

張文朝^{*}

一、前言

南宋朱熹(1130-1200)喊著反對以《詩序》說《詩》的口號，揭櫫「以詩說詩」的主張，匯集前賢與時人之說，纂著了《詩集傳》。此書傳到日本的確切時間雖然不可考，但是室町時代(1336-1573)的應永十年(1403)，岐陽方秀(1363-1424)以明朝舶載書《詩集傳》等講學¹，博士家清原宣賢(1475-1550)也將《詩集傳》拿來與《毛詩》對照講學²，可見日本室町時代的禪學界及博士家都已有所接觸。到了江戶時代(1603-1868)，更透過朱子學者藤原惺窩(1561-1619)、林羅山(1583-1657)等人的推展³，廣為學者研究，其中古義學派的伊藤仁齋(1627-1705)以為朱熹

感謝審查人給予本文多方指導。

* 張文朝，本所助研究員。

¹ 足利衍述：《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》（東京：有朋書房，1970年復刻版），頁362-364。另見和島芳男：《中世の儒学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65年），頁79、《日本宋学史の研究》（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88年），頁110；久須本文雄：《日本中世禅林の儒学》（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1992年），頁189。

² 足利衍述：《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》，頁495-501。

³ 藤原惺窩研究，見張文朝：〈日本儒學史（六）：江戶時代之儒學（一）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6輯（1999年6月），頁267-294、〈日本江戶時代（1603-1868）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〉，《儒學研究論叢》第2輯（2009年12月），頁27-45。林羅山研究，見張文朝：〈日本儒學史（七）：江戶時代之儒學（二）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11輯（2003年6月），頁249-264。

廢《小序》「而悉據經文則事多有害於義者」。古文辭學派的荻生徂徠(1666-1728)認為《詩集傳》是朱子「著作中寫得特別不好的作品，所以危害也較少」；太宰春臺(1680-1747)認為「朱氏之書，唯《詩傳》為其所不甚用心，故比他所著，猶為寡過」；渡邊蒙菴(1687-1755)認為朱熹《詩集傳》「濫立新義，專用臆說，豈可謂《傳》耶？曰之註則可也」。如是這般，古學派學者各持不同意見，以撻伐《詩集傳》⁴。

本文主要目的在比較、分析赤松太庾(1709-1767)《詩經述·二南》與朱熹《詩集傳·二南》的異同，以檢視《詩經述》與《詩集傳》有何關聯？所以本研究對象將只限定在〈二南〉二十五篇詩，不涉及十三〈國風〉、二〈雅〉、三〈頌〉。

⁴ 各學者的研究，如：(1) 仁齋研究：伊藤仁齋：《語孟字義·卷之下·詩第三條》，收入吉川幸次郎、清水茂：《伊藤仁齋·伊藤東涯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1年），頁155。(2) 徂徠研究：島田虔次編輯：《荻生徂徠全集》（東京：みすず書房，1973年），第1卷，頁484。(3) 春臺研究：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·後序》，收入關儀一郎：《日本儒林叢書》（東京：鳳出版，1978年），第11冊，頁1。(4) 蒙菴研究：渡邊蒙菴：《詩傳惡石·詩經集傳開卷講義》（手抄本，1739年）。各學者的《詩經》學研究，如：(1) 伊藤仁齋的《詩經》學：土田健次郎：〈伊藤仁齋の詩經觀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6號（1981年6月），頁13-19；張文朝：〈伊藤仁齋の詩經觀について〉，《九州中国学会報》第45卷（2007年5月），頁107-121；清水徹：〈東洋の學藝——伊藤仁齋における《詩經》觀〉，《東洋文化》第100號（2008年4月），頁12-26。(2) 荻生徂徠的《詩經》學：高橋博巳：〈徂徠学における《詩》について〉，《日本思想史研究》第5號（1971年5月），頁32-41；淺山佳郎：〈服部南郭の「詩」の意識：徂徠と南郭の詩經觀をめぐって〉，《上智大学国文学論集》第18號（1985年1月），頁143-160；張文朝：〈荻生徂徠の詩經觀について〉，《中国哲学論集》第31、32合併號（2006年12月），頁97-120。(3) 太宰春臺的《詩經》學：石本道明：〈太宰春臺の詩觀について——徂徠学の繼承をめぐって〉，《日本文學論究》第44冊（1985年1月），頁79-86；白石眞子：〈太宰春臺の「讀詩」の要領——《論語古訓外伝》を通して見る《詩》と孔子〉，《漢文學解釈と研究》第7輯（2004年12月），頁133-161、〈太宰春臺の「詩論」〉，《東方学》第114輯（2007年7月），頁84-100、〈渡邊蒙菴《詩傳惡石》考——徂徠、春臺「讀詩」の系譜〉，《和漢比較文学》第39號（2007年8月），頁26-41、《太宰春臺の詩文論——徂徠学の繼承と転回》（東京：笠間書院，2012年）；張文朝：〈太宰春臺的詩經觀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14輯（2006年12月），頁151-184。(4) 渡邊蒙菴的《詩經》學：內田旭：〈濱松處士渡邊蒙菴に就て〉，《静岡縣郷土研究》第15號（1941年4月），頁92-104；村山吉廣：〈渡邊蒙菴の《詩傳惡石》について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2號（1975年5月），頁16；白石眞子：〈渡邊蒙菴《詩傳惡石》考——徂徠、春臺「讀詩」の系譜〉，《和漢比較文学》第39號（2007年8月），頁26-41；張文朝：〈渡邊蒙菴《詩傳惡石》對朱熹《詩集傳》之批判——兼論其對古文辭學派《詩經》觀之繼承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32卷第1期（2014年3月），頁173-208。

古文辭學派由荻生徂徠首倡於元祿年間(1688-1704)，以排斥程、朱之學為主，盛行於享保、寬延(1716-1751)之際，到了寶曆年間(1751-1764)折衷學派出現之後，才逐漸衰退⁵。赤松太庾的生存年代，正是處於古文辭學派衰退期間，特別是在《詩經》解釋學中與徂徠、春臺有什麼關聯？他在《詩經述·二南》中有無提出自己的觀點？這些觀點在江戶時代的學術環境中，又有著什麼樣的意義？這些都是值得探討、研究的問題。

本文針對上述的諸多疑點展開研究，論述步驟如下：首先就太庾的生平與著作做一簡介，以便對太庾其人其書有個基本認識。接著比對太庾《詩經述·二南》與朱熹《詩集傳·二南》的異同，綜合成幾個項目，分別加以說明，文中先陳述朱熹的論點，再提太庾的部分，後述徂徠、春臺等古文辭學派學者的批評及觀點，以考察太庾觀點背後的學術環境因素。進而提出太庾不同於朱熹、徂徠、春臺的看法，以知太庾的解《詩》觀點。最後做出本文的總結。

二、太庾的生平與著作

赤松太庾，名弘，又用於通稱，字毅甫，號太庾、又號赤草，別號述齋、木瓜翁，江戶人。江戶時代中期的儒者。

關於太庾的生平資料，世人所知不多，現有的撰述大多來自《先哲叢談》後編卷五的轉述，其記述如下：

太庾弱冠學于家庭，慨然歎曰：「先王之教，成周備矣，昭昭如日月，今遇封建之制，當是之時，不修經術，於男兒之業，果其何為哉？」於是專精六經，研究不已，遂以經藝名於當時。其學不專主漢、宋，自成一家言，後著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解》，謂《九經述》，書成，凡百三十卷，可謂富矣。我邦作為群經註解，未嘗有若斯浩瀚卷帙者，識者歎服云。

太庾常以名教為己任焉，其自信甚厚，王侯貴人雖以厚幣豐祿而招，不敢就官。曰：「我豈若得四方髦俊之士而教育之，各成其德，各達其材，以使各供其國家之用哉。」而弗敢願，人皆高其操志焉。

⁵ 張文朝：〈日本江戶時代(1603-1868)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〉，頁27-45。

太庾資稟雍熙，絕無浮躁粗豪之氣，其行敦篤而鎮重。松觀海稱曰：「毅甫風義高標，雄視一世，足以為後進師表矣。」⁶

據此可知，太庾專攻經學，在當時群經註解之豐，無人能敵。學風「不專主漢、宋」，自成一家之言。《先哲叢談》後編的編者東條耕（琴臺，1795-1878）謂其著述為日本「作為群經註解，未嘗有若斯浩瀚卷帙者」，雖不免有誇飾之可能，但以所著「凡百三十卷」的數量來看，也著實「可謂富矣」，令人為之「歎服」不已矣。論其學所承，則在《漢文學者總覽》中，列其師名為太宰春臺⁷，《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》更說太庾「初學業於家庭，後入太宰春臺之門」⁸。由此可知其學承自古文辭學派的太宰春臺。

太庾的著作，除上述的資料之外，從《補訂版國書總目錄》中，也可以找到以下的著作，如：

1. 《赤草子》：二編二冊，愛知縣西尾市立圖書館岩瀨文庫有自筆寫本。
2. 《孝經述》：寶曆六年(1756)刊，一冊，國會圖書館、教育大學、慶應大學、東北大學、無窮會。
3. 《論語述》：寶曆十二年(1762)刊，教育大學、慶應大學、早稻田大學。
4. 《詩經述》：五冊，抄本，早稻田大學。
5. 《初學聖賢問辨初篇》：京都大學。
6. 《春秋述》：《日本左傳研究著述年表並分類目錄》。
7. 《家語述》：《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》。
8. 《易述》：《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》。
9. 《二禮述》：《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》。
10. 《禮記述》：《漢學者傳記及著述集覽》。
11. 《九經述》：一百三十卷，《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》⁹。

⁶ 以上見東條耕：《先哲叢談》（刊本，1829年），後編卷5，頁28-29。及轉譯自竹林貫一：《漢學者傳記集成》（東京：名著刊行會，1978年），頁361-362。松觀海(1725-1776)，漢學者，丹波（今兵庫縣）人，學儒於太宰春臺，著有《觀海樓論語記聞》七卷等書。

⁷ 長澤孝三：《漢文學者總覽》（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2年），頁7。

⁸ 關儀一郎：《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》（東京：琳瑯閣書店，1981年），頁11。

⁹ 轉錄自安江良介發行：《補訂版國書總目錄》（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89年），第1、2、3、4、6、8冊。

前面五種著作都有其書，後五種目前不見館藏地。最後一項《九經述》應該就是《九述》，根據寶曆六年菅谷千秋（生卒年不詳）〈刻《孝經述·序》〉中所言：

嗟夫！先生〔太庾〕從徂徠則服孔子，從孔子則信先王，信先王則知六經、二語之不可不讀。知而好之，好而樂之。於是乎有《九述》，曰《易》、曰《書》、曰《詩》、曰《二禮》、曰《春秋》、曰《孝經》、曰《論語》、曰《家語》、曰《禮記》，述其所自得也。¹⁰

可知《九述》即《九經述》。然而上列著作中獨缺《書經述》，未知是否有撰作？

如上所述，太庾為春臺的學生，春臺之學承自荻生徂徠。徂徠眾多門人之中有《詩經》相關專著的只有五人，春臺是其中之一，著有《朱氏詩傳膏肓》、《六經略說》、《詩論》，編有《詩書古傳》¹¹；春臺的學生之中有《詩經》相關專著的只有四人，太庾是其中之一¹²。所以論及古文辭學派的《詩經》研究，太庾是不可忽略的人物。然而對於太庾的《詩經述》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尚未有學者提出專論，只有日本村山吉廣曾在《詩經研究》第五號〈詩經關係書目解題（一）〉的第二則介紹了此書，他說：

本書多抄引朱子《集傳》，其間雖然也有時而代之以毛、鄭之說。但全書無引用他書，也沒有提出甚麼新見。敘述雖然明快，但不能說是有特色的著述。¹³（筆者譯）

據此，則該書大體上是以前朱熹《詩集傳》為抄錄的底本，只在其間以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之說代之，全不用他書，是沒有特色的著作。筆者認為「本書『多』抄引朱子《集傳》」這句話，正意味著本書有「少」部分不抄錄朱熹《詩集傳》，然則太庾為什麼不錄？《詩經述》果真如村山所言間以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代之，而全不

¹⁰ 赤松太庾：《孝經述·序》（刊本，1756年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版），頁3（頁碼筆者自編，以下同）。

¹¹ 除春臺外，其他四人分別是山井崑崙（?-1728）著有《七經孟子考文》、山縣周南（1687-1752）著有《詩藪詩考》、荻生北溪（1673-1754）著有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》、諏訪忠林（1703-1770）著有《古今詩書》。

¹² 徂徠學生63人，春臺學生36人。此人數是根據關儀一郎《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》書後所附錄的〈漢學者學統譜〉而來（頁64-74）。春臺的4名學生除太庾外，還有渡邊蒙菴著有《詩傳惡石》、五味國鼎（1718-1754）著有《詩書古傳補考》、森蘭澤（1722-1777）著有《毛詩通義》。後兩者之著作，所藏地不詳。

¹³ 村山吉廣：〈詩經關係書目解題（一）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5號（1980年4月），頁18。

引用他書嗎？筆者因此試就《詩經述·二南》二十五篇仔細對照朱熹《詩集傳》二十卷本¹⁴，結果發現太庾在抄錄朱熹〈二南〉詮釋時，確實有些部分沒有抄錄，而且觀察沒有抄錄的部分，大部分又多是古學派學者批判朱熹《詩集傳》的觀點。然筆者並無意指稱凡沒有抄錄者皆意在批判，或僅是強調《詩經述》沒有抄錄的地方，大多是古學派學者批判朱熹《詩集傳》的觀點。這是單純的巧合嗎？如果是則這種巧合就十分有趣了。但筆者將之放在古文辭學派的脈絡中思考此問題，認為這並非單純的巧合，而是太庾刻意不形諸文字記載的一種表現方式。這種不形諸文字記載的做法，本文稱之為「不錄」，筆者以為就太庾的《詩經述》而言，「不錄」除了不形諸文字記載之外，其實不用朱熹之說，引用他書以為說，或直接訴諸己說的形式，也是另一種「不錄」的表現方式。因此，本文以下分不形諸文字記載的「不錄」、不用朱說而用他說的「不錄」、不用朱說而用己說等三小節，針對《詩經述》「不錄」的形式加以探討，以見太庾如何處理這種「不錄」的無言批判。

三、不形諸文字記載的「不錄」

太庾在《詩經述》中有些方面不抄錄《詩集傳》，到底是哪些部分呢？單就〈二南〉而言，就將近有四十處刻意缺而「不錄」，以下就幾個項目，分別說明。

（一）不錄與叶韻有關者

朱熹《詩集傳》對《詩經》的音韻處理，大致以反切、叶音、直音為主¹⁵。太庾《詩經述》則多為反切或直音，《詩經述·二南》二十五篇中反切八十九例、直音三十例。再者，《詩經述》除了參考《詩集傳》之外，也確實如村山吉廣所言，有些是參考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。但是在經文的音韻方面，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無注，所以《詩經述》中的注音除了參考《詩集傳》之外，更多是參考陸德明《經典釋

¹⁴ [宋]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第1冊。

¹⁵ 《詩集傳·二南》二十五篇中反切92例、叶一反43例、直音31例、叶（韻）音6例，「如字」與「上聲」各一例，共計174例（其中有12例，兼兩種以上，如〈關雎〉第三章「左右芼之」，芼：莫報反，叶音邈）。又，朱熹《詩集傳》的叶音、韻例研究，可參考陳鴻儒：《朱熹詩韻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

文·毛詩音義》，例如：〈關雎〉首章「關關雎鳩」的「雎」，《詩經述》注為「七胥反」¹⁶。〈關雎〉二章「參差荇菜」的「荇」，《詩經述》注為「衡猛反」等即是¹⁷。

實則太庾也有自己的字音，例如：〈殷其雷〉三章「莫或遑處」的「處」，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無注。《經典釋文·毛詩音義》、《詩集傳》二十卷本同為「處，尺煮反」¹⁸，《詩經集註》八卷本直接作「上聲」¹⁹。《詩經述》注：「處，昌慮反。」另外〈江有汜〉二章「其後也處」的「處」，以上各書都無注，《詩經述》依然注為：「處，昌慮反。」可見太庾有自己的字音。再如：〈小星〉二章「維參與昴」的「參」，《經典釋文·毛詩音義》為：「參，所林反。星名也，一名伐。」²⁰《詩集傳》二十卷本作：「參，所林反。」²¹八卷本作：「參，所森反。」²²《詩經述》注：「參，所金反。」或以為「林」、「森」、「金」三字在《廣韻》中皆屬下平聲侵韻，與「所」反切後發音相同，太庾不用以上各書的反切字音，轉用自己的「所金反」，並無意義。理或如此，但太庾知道用與《經典釋文》、《詩集傳》同韻的「所金反」，足見他能夠掌握音韻的問題。再者引起筆者注意的是，太庾既然知道他使用「所金反」的結果將與《經典釋文》、《詩集傳》無異，那他為什麼要大費周章改此換彼，刻意「不錄」《詩集傳》的標法？筆者以為，太庾之所以如此，是要表達《詩經述》雖是抄錄《詩集傳》而成，但也有自我的看法。如果從這點來思考，那麼太庾的「不錄」《詩集傳》的標法就有它的意義了。

可見單就《詩經》的字音方面來說，並不是像村山所說的「全書無引用他書」。其中與叶韻有關的字音，一例也沒有抄錄。例如，〈關雎〉二章「寤寐思服」的「服」，《詩集傳》注為「服，叶蒲北反」²³，太庾《詩經述》並無注此音。再如，〈葛覃〉首章「其鳴喈喈」的「喈」，《詩集傳》注為「喈，叶居奚反」²⁴，太

¹⁶ [唐]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第182冊，頁424。《詩集傳》注為「七余反」，見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02。

¹⁷ 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頁428。《詩集傳》注為「行孟反」，見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02。

¹⁸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16。

¹⁹ 朱熹集註：《詩經集註》（臺北：群玉堂，1991年），頁9。

²⁰ 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頁428。

²¹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17。

²² 朱熹集註：《詩經集註》，頁10。

²³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02。

²⁴ 同前註，頁404。

庾《詩經述》依然無注此音。又如，〈卷耳〉首章「寘彼周行」的「行」，《詩集傳》注為「行，叶戶郎反」，太庾《詩經述》則改用《經典釋文·毛詩音義》注為「行，戶康反」²⁵。

由以上的舉例，可以說明太庾不重視朱熹頗為在意的叶韻問題²⁶。太庾不贊同朱子的叶韻說，所以書中不採錄，既然太庾不贊同朱子之說，書中自然不會出現。亦即身為古文辭學派的太庾，以不錄朱熹重視的叶韻，作為他對《詩集傳》的無言批判。

（二）不錄與「勸戒」有關者

在解釋「國風」時，朱熹謂：

舊說〈二南〉為正風，所以用之閭門、鄉黨、邦國，而化天下也。十三國為變風，則亦領在樂官，以時存肄，備觀省而垂監戒耳。²⁷

太庾把這段話移到解釋〈周南〉的地方，說：「舊說從〈關雎〉至〈騶虞〉二十五篇謂之正風，蓋風詩聲音之正者也。」²⁸雖然解釋了〈二南〉之所以為正風，是因為其詩的聲與音在國風中是正的，所以謂之正風，但卻一字也不提「十三國為變風，則亦領在樂官，以時存肄，備觀省而垂監戒」。即使在解釋〈邶〉風處也僅稍微變更朱熹之說，謂：「舊說以從〈邶〉訖〈豳〉十三國，皆為變風焉。」而「則亦領在樂官」以下，一字都不錄。其實朱熹本人似乎對「正變」之說頗不以為然，所以他才會說：「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二國凡二十五篇，先儒以為正風，今姑從之。」²⁹從這一句「今姑從之」也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吧！朱熹又在「陳國」總論中引呂東萊(1137-1181)之言說：

正風之所以為正者，舉其正者以勸之也。變風之所以為變者，舉其不正者以

²⁵ 同前註，頁 405；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14（頁碼筆者自編，以下同）；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頁 425。

²⁶ 「因學者問《大學》敖惰處，而曰：『某嘗說，如有人問《易》不當為卜筮書，《詩》不當去〈小序〉，不當叶韻，及《大學》敖惰處，皆在所不答。』」見《朱子語類》卷 16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，第 14 冊，頁 546。另在卷 80 也多所討論，見同前書，第 17 冊。

²⁷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01。

²⁸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5。

²⁹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20。

戒之也。³⁰

可知朱熹藉呂東萊之言，以表達自己把正變的功能側重在「勸戒」之上。然而太庾只解釋了「正風」，不錄：「所以用之閨門、鄉黨、邦國，而化天下也。十三國為變風，則亦領在樂官，以時存肄，備觀省而垂監戒耳。」為什麼不錄這段話？太庾自己並無交代，但是如果從他的老師太宰春臺所著《朱氏詩傳膏肓》中對朱熹的批判，可以得到解答。春臺對此批判說：

正風變風之名固也。正風者，皆處順地者所作；變風者，多處逆地者所作。詩人所處雖異，而其言出於中情則同也。中情者何？好惡悲歡也。君子誦變風，則能知人情之曲折，是以夫子列之篇，雖淫奔之詩而不舍也。若以備觀省而垂鑒戒，如晦菴之云，則先王以詩教人，豈非誨淫乎？今當削自「所以」至「下也」十五字，自「則亦」至「戒耳」十八字，共三十三字。³¹

這說明了太庾所以不錄此段，正因為遵從師教之故，認為詩是用來「言情」，非為「勸戒」，所以太庾也就不抄錄這段話了。這從表面上來看，似乎只是止於不錄而已，然而其深層涵義，正是身為古文辭學派學者堅持的一貫主張。只是春臺顯而批之，太庾隱而不錄，其實同樣是在批判朱熹《詩集傳》的不是。

（三）不錄與「八德目」有關者

在「〈周南〉卷首」，朱熹謂：

武王崩，子成王誦立。周公相之，制作禮樂，乃采文王之世，風化所及，民俗之詩，被之箏弦，以為房中之樂，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、邦國。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，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者，皆得以取法焉。蓋其得之國中者，雜以南國之詩，而謂之〈周南〉。³²

這段話太庾抄錄了大部分，但是獨獨不錄：「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者，皆得以取法焉。」因為這是與《大學》八德目密切相關之故。

再如朱熹之「〈周南〉總論」說：

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。〈關雎〉舉其全體而言也，〈葛覃〉、〈卷耳〉

³⁰ 同前註，頁 522。

³¹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收入關儀一郎：《日本儒林叢書》（東京：鳳出版，1978年），第 11 冊，頁 1-2。

³²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01。

言其志行之在己，〈樛木〉、〈螽斯〉美其德惠之及人，皆指其一事而言也。其詞雖主於后妃，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。至於〈桃夭〉、〈兔置〉、〈采芣苢〉則家齊而國治之效。〈漢廣〉、〈汝墳〉則以南國之詩附焉，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。若〈麟之趾〉則又王者之瑞，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，故復以是終焉，而序者以為〈關雎〉之應也。夫其所以至此，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。然妻道無成，則亦豈得而專之哉！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，其亦誤矣。³³

更可見朱熹之意在顯揚〈周南〉詩篇有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之效用。而太庾整段不錄一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春臺曾批判過此段，謂：「亦評語也。」³⁴只要是朱熹自己的言論，絕大部分被春臺評為「評語」或「評論」³⁵，春臺以為：「自漢至唐，諸儒釋經，但解本文，不下評語，古法迺爾。晦菴注經，好為譏評，仲尼而下，盡在所評。」³⁶在有這樣的師訓之下，太庾當然不敢錄一字了。

朱熹在解釋〈鵲巢〉首章詩旨時，說：

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，能正心、修身以齊其家，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，而有專靜純一之德，故嫁於諸侯，而其家人美之曰：「維鵲有巢，則鳩來居之，是以之子于歸，而百兩迎之也。」此詩之意，猶〈周南〉之有〈關雎〉也。³⁷

太庾解釋說：「此言夫人性貴禮盛也。〈召南〉，〈鵲巢〉為首，猶〈周南〉，〈關雎〉為首也。」³⁸完全不錄朱熹的：「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，能正心、修身以齊其家，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，而有專靜純一之德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為春臺有評語說：

南國諸侯，被文王之化，其女子被后妃之化，則有之矣。惟於詩辭，未見其所謂正心、修身以齊其家，及其女子有專靜純一之德耳，不識晦菴何以言之？³⁹

既然老師批評不知朱熹「何以言之」，且在詩的字面上又看不出有「正心、修身以

³³ 同前註，頁 411。

³⁴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 5。

³⁵ 「評語」有 83 處，「評論」4 處，參見同前註。

³⁶ 同前註，頁 2。

³⁷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11-412。

³⁸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34。

³⁹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 5。

齊其家」之意，太庾當然就不錄了。

朱熹解釋〈騶虞〉首章詩旨時，謂：

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，脩身、齊家以治其國，而其仁民之餘恩，又有以及於庶類，故其春田之際，草木之茂，禽獸之多，至於如此。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，且歎之曰：此其仁心自然，不由勉強，是即真所謂騶虞矣。⁴⁰

太庾也不錄「脩身、齊家以治其國」之句。蓋其師春臺曾批判朱熹說：「亦朱氏私家之說也。」⁴¹又，〈騶虞〉篇末，朱熹說：

文王之化，始於〈關雎〉而至於〈麟趾〉，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。形於〈鵲巢〉而及於〈騶虞〉，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。蓋意誠、心正之功不息而久，則其熏烝透徹，融液周徧，自有不能已者，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。故〈序〉以〈騶虞〉為〈鵲巢〉之應，而見王道之成，其必有所傳矣。⁴²

朱熹意在指出文王「意誠、心正、身脩」之功效，卻被春臺批判為：「評語，乃心法之說。」⁴³太庾在此也是一字不錄。

朱熹更在「〈召南〉總論」中提到：

愚按：〈鵲巢〉至〈采蘋〉言夫人、大夫妻，以見當時國君、大夫被文王之化，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。〈甘棠〉以下，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，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。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，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，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。⁴⁴

朱熹想用〈二南〉詩篇傳達《大學》之道的意圖，於此昭昭然可見矣。又引程子之說：「天下之治，正家為先。天下之家正，則天下治矣。〈二南〉，正家之道也。陳后妃、夫人、大夫妻之德，推之士庶人家一也。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，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，所以風化天下。」⁴⁵以強調〈二南〉詩篇中的文王能明德、新民，意誠、心正、身脩之故，所以有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之效。然而遭到春

⁴⁰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20。

⁴¹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 7。

⁴²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20。

⁴³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 7。

⁴⁴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20。

⁴⁵ 同前註，頁 421。

臺批判：「愚按止疑耳，程子曰止風化天下。皆評語也。」⁴⁶ 太庾因而也就隻字不錄了。

然而「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這句話在朱熹而言，卻有其重要性，朱熹在《詩集傳·序》中回答或問「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」時說：「則脩身及家，平均天下之道，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。」⁴⁷ 亦即朱熹認為只要學了《詩》就可以得到《大學》中所言「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內聖外王依據，朱熹似乎指出《大學》所言是內聖外王的理論，《詩》篇所言則是內聖外王的實例，所以從《詩》篇的實例中，得以取而效法之。然而這在太庾而言，卻是其無言批判的所在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古文辭學派學者對這個觀點曾有過批判，批判者正是太庾的師祖荻生徂徠，他說：

朱子在《詩傳·序》說：「如果治得六經中的任何一經，即可求得脩身、治國、平天下，而不用他求。」這種認為用一經就足夠的說法，就像浮屠主張專治一部《法華》或《華嚴》就可以盡得佛理一樣。佛法歸佛法，他們要那樣做也行，但是，聖人之道則不然，若不通貫六經，則其用不足。⁴⁸（筆者意譯）

接著更明白地說：

〔《詩》〕與日本的和歌一樣，既不是說脩己治人之道的東西，也不是提示治國平天下之法的東西。⁴⁹（筆者意譯）

徂徠認為《詩》既不言「脩己治人之道」，又不示「治國、平天下之法」，那麼，朱熹這些說法，當然成了太庾的批判對象，因而不被抄錄了。

（四）不錄與特定人物有關者

詮釋〈關雎〉首章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時，朱熹說：

⁴⁶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7。

⁴⁷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351。

⁴⁸ 荻生徂徠：《經子史要覽·經要覽總論》卷之上，收入島田虔次編輯：《荻生徂徠全集》（東京：みすず書房，1973年），第1卷，頁506。

⁴⁹ 同前註，頁506-507。在《徂徠先生答問書》中，也有可以看到同樣的論調，收入島田虔次編輯：《荻生徂徠全集》，第1卷，頁460。

女者，未嫁之稱，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。君子則指文王也。⁵⁰ 在這個釋文中，朱熹把〈關雎〉中的男女主角特定為文王及其妃子太姒，而且不只〈關雎〉一篇而已，在朱熹詮釋的《詩集傳·二南》二十五篇中，與文王相關的多達十八篇，與后妃有關的則有七篇⁵¹，而且與后妃有關的這七篇詩，朱熹認為其背後也是因為有文王之德所致⁵²。如此看來，〈二南〉二十五篇就全部與文王相關，或說文王本身的事蹟，或說受文王德化的效應。這麼重要的男女主角，太庾卻不抄錄，為什麼呢？如果參照〈卷耳〉篇來看的話，即可得到解答。

〈卷耳〉首章：「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」朱熹解：「人，蓋謂文王也。」⁵³ 太庾則說：「人，謂良人也。」⁵⁴ 顯然兩人的解釋差異很大。朱熹明指此人為文王，原因在於〈序〉謂：

〈卷耳〉，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，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⁵⁵

朱熹在《詩序辨說》中說：「此詩之〈序〉，首句得之，餘皆傳會之鑿說。」⁵⁶ 亦即朱熹只同意此〈序〉首句所說：「〈卷耳〉，后妃之志也。」既然〈卷耳〉是吟詠后妃之志的詩篇，如前所說，〈二南〉二十五篇又都與文王有關，則〈卷耳〉詩中的「我」當然是指后妃太姒，后妃所思念的對象，當然只能是文王了。但太庾卻以「良人」一語輕輕帶過，這兩者的解釋不同，看似單純，其實在太庾的解釋背後，依然有著師傅的依據。春臺批判朱熹對此解釋的不當，說：

人，良人也。凡詩稱人，稱君子，固有所指也，然不可指定誰某耳，此人

⁵⁰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02。

⁵¹ 其中〈何彼穠矣〉受文王、太姒之教，〈采芣苢〉則因「化行俗美，家室和平，婦人無事，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」。

⁵² 「其詩雖若專美太姒，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。序者徒見其詞，而不察其意，遂壹以后妃為主，而不復知有文王，是固已失之矣。至於化行國中，三分天下，亦皆以為后妃之所致，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，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為寄生之君也，其失甚矣。」見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，第 1 冊，頁 355。

⁵³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05。

⁵⁴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15。

⁵⁵ 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57。

⁵⁶ 同前註。

字，晦蒼以為指文王，妄也。⁵⁷

由春臺的這則解釋，不難瞭解太庾為什麼在解釋〈關雎〉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時，不把淑女解為「太姒」、君子解為「文王」了。

再如〈汝墳〉三章：「雖則如燬，父母孔邇。」朱熹解「父母」說：「指文王也。」意味：「文王之德如父母然，望之甚近，亦可以忘其勞矣。」⁵⁸ 太庾則只錄：「父母孔邇，猶曰父母至親也。」⁵⁹ 義雖相近，卻不錄「父母，指文王也」及「文王之德如父母然」，可知太庾不認為朱熹的比喻恰當，所以不抄錄，以示其無言的批判。

又如解釋〈麟之趾〉首章詩旨時，朱熹說：

文王、后妃德脩於身，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，故詩人以〈麟之趾〉興公之子。言麟性仁厚，故其趾亦仁厚。文王、后妃仁厚，故其子亦仁厚。⁶⁰

太庾把「文王」去除，使之成為泛言后妃的事，說：「后妃德盛，故王室子孫宗族，皆化於善。乃詩人以麟比興，反覆嗟歎。言其信厚之德也。麟之出也，聖人之應也。仁厚公子，后妃之應也。」⁶¹ 如此一來，〈麟之趾〉的后妃就不會被特定為文王的后妃太姒了，更可以與他自己在〈關雎〉首章所言的詩旨「此泛言后妃之德也」相應。而此一處理正透露出，太庾雖表面抄錄朱熹《詩集傳》，實則卻是偏向《詩序》的心態。

朱熹試圖把〈周南〉詩篇的詮釋，透過表彰文王本身的身脩、家齊，以達國治、天下平之效，再佐以〈召南〉的詩篇，以明因被文王之德化，所以諸國國君、大夫也能脩其身、齊其家、治其國，以廣為顯揚文王明德、新民之功，以完成詮釋〈二南〉詩篇的統一性及系統化⁶²。但是太庾並不把〈周南〉的詩篇視為文王身脩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之效，所以完全不錄朱熹《詩集傳》中〈周南〉有關文王的

⁵⁷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3。

⁵⁸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10。

⁵⁹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30。

⁶⁰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10。

⁶¹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36。

⁶² 林慶彰：〈朱子《詩集傳·二南》的教化觀〉，收入鍾彩鈞主編：《朱子學的開展·學術篇》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2002年），頁65-66。又見陳志信：〈理想世界的形塑與經典詮釋的形式——以朱熹《詩集傳》對〈二南〉的詮釋為例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21卷第1期（2003年6月），頁302。

敘述與詮釋，從〈關雎〉稱「泛言后妃之德」，到〈麟之趾〉依然認定是「后妃德盛」。但到了〈召南〉、〈甘棠〉以後，卻陸續出現了「布文王之政」、「服文王之化」等抄錄。例如在〈甘棠〉首章依照朱熹的詩旨解說，重新詮釋本章詩旨說：

召公奭循行南國，以布文王之政，或嘗憩息此棠樹之下，今其雖在他，此土之人，猶思其德，故愛其樹，而不忍傷也。⁶³

可知太庾同意朱熹「召伯循行南國，以布文王之政」的文王效應之說⁶⁴。又如〈行露〉首章解釋詩旨，也是依照朱熹之意說：「南國之人，遵召伯之教，服文王之化，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。」⁶⁵解釋〈羔羊〉首章詩旨，謂：「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容止可觀者如此。」⁶⁶也同於朱熹。再如解釋〈騶虞〉首章詩旨時，說：「召南之國，被文王之化，以安其民。」⁶⁷甚至有朱熹不以為是文王，太庾卻認為是文王，例如在解釋〈何彼襮矣〉二章「平王之孫，齊侯之子」時，朱熹說：

舊說，平，正也。武王女，文王孫，適齊侯之子。或曰：平王即平王宜臼，齊侯即襄公諸兒。事見《春秋》，未知孰是。⁶⁸

朱熹不敢確定哪個說法正確，所以並列「舊說」與「或曰」，宣稱自己「未知孰是」，太庾則先是說：「平，正也。」其後卻明白地指出「平王謂文王也」⁶⁹。太庾先前不認為〈周南〉與文王有關，之後卻把〈召南〉視為被文王之化，恐是其欲去文王這個特定人物的抄錄動機未能一貫的結果吧！

（五）不錄與性理之學有關者

「以理說詩」的解《詩》方法是朱熹《詩集傳》為後世批評的重點，太庾似乎也注意到這一點，所以對朱熹的〈二南〉詮釋中，有與性理之學相關的論述，一概不錄。例如，朱熹在〈關雎〉篇末解釋孔子「〈關雎〉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時說：

⁶³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41。

⁶⁴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14。朱熹認為此章的詩旨是：「召伯循行南國，以布文王之政，或舍甘棠之下，其後人思其德，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。」

⁶⁵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42。

⁶⁶ 同前註，頁 45。

⁶⁷ 同前註，頁 58-59。

⁶⁸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19。

⁶⁹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57。

愚謂：此言為此詩者，得其性情之正、聲氣之和也。蓋德如睢鳩，摯而有別，則后妃性情之正，固可以見其一端矣。至於寤寐反側，琴瑟鐘鼓，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，則詩人性情之正，又可以見其全體也。獨其聲氣之和，有不可得而聞者。雖若可恨，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，則亦可以得學《詩》之本矣。⁷⁰

這一段太庾完全不錄，其師春臺批判朱熹說：「晦菴注經，好為譏評，仲尼而下，盡在所評。縱使其言之善，尤非恭遜之道也，況其所論，皆性理之談，心法之說，非孔氏之道者乎。」⁷¹ 足見這種「性理之談，心法之說，非孔氏之道」的論調，太庾也繼承了下來。只是太庾採取了無言的批判，不抄錄而已。令人不解的是：為什麼太庾不錄的部分與春臺批判的部分如此的吻合呢？筆者推測，很有可能是太庾根據老師春臺的授課內容，在讀本上增刪，然後再行謄寫，最終成為今日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之《詩經述》寫本。如此推測或許能說明，太庾不錄的部分與其師春臺批判的部分如此契合的原因吧！

四、不用朱說而用他說的「不錄」

以上探討了太庾不形諸文字的記載，刻意缺而「不錄」朱熹注釋的現象。接著探討太庾在抄錄朱熹《詩集傳·二南》時，明明朱熹有解說，但太庾卻不用，而用「他說」的情況。這裏所謂「他說」，指朱熹之外的其他說法，亦即：太庾引用他書以為說，以表現出另類的「不錄」方式。就〈二南〉而言，這類的「不錄」有八十六處之多，下面就幾個項目，各舉二、三例分別說明。

（一）不用朱說，而用毛《傳》

朱熹解釋「卷耳」，謂：「卷耳，泉耳。」太庾謂之：「卷耳，苓耳。」這個解釋援用了毛《傳》。

〈螽斯〉首章「詵詵」，朱熹注「和集貌」，其義當不止於「多」，且有「群處和集」（團結、和睦相處）之意。太庾依毛《傳》注為「眾也」，僅僅著重在「眾

⁷⁰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03。

⁷¹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2。

多」之表現，並無團結、和睦之意。

朱熹注〈芣苢〉詩中的「采之」、「有之」、「掇之」、「捋之」、「袺之」、「襮之」，似有從開始採而得之，挑選而取其子，再將子以衣襟兜著，到最後再把衣襟插在腰帶上帶回去的一連串動作的完整性。朱熹於首章注「有，既得之也」，太庾則用毛《傳》為「藏之也」，則才始言「採之」，立刻終於「藏之」，也與朱熹大不同。

〈汝墳〉首章「未見君子，惄如調飢」。朱注「調」為「一作輻，重也」，太庾取毛《傳》注為「朝也」。朱熹解釋「輻，重也」，是指物之輕重，則「惄如調飢」直譯為「飢如重飢」，如重飢般地飢餓。太庾引毛《傳》注為「朝也」，則直譯為「飢如朝飢」，如朝飢般地飢餓，不用朱熹之注，也是可以理解的⁷²。

〈騶虞〉首章「彼茁者葭，壹發五豝」。此處朱熹注「豝」，謂「牡豕也」，太庾依毛《傳》注為「牝豕也」。同是「豝」字，卻因人而有雌雄不同之解。其實，清人姚炳在其所撰《詩識名解》中也有過同樣的疑問，他說：「《集傳》訓豝為牡豕，與〈釋獸〉諸書異，不知何據？」⁷³但即使是同一人作解，也有前後不一的時候。例如，朱熹在解〈小雅·吉日〉之四章「發彼小豝，殪此大兕」時，就依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注為「豕牝曰豝」。可見朱熹自己也無定見⁷⁴，毋怪乎太庾要去朱就毛了。

⁷² 就經文字義上的解釋而言，兩者對於「惄如調飢」的解釋，似乎都不如鄭《箋》之解明快。鄭以為「惄」是「思」，所以解「惄如調飢」為「如朝飢之思食」，就通順些了。

⁷³ [清]姚炳：《詩識名解》卷6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6冊，頁27。

⁷⁴ 明馮復京《六家詩名物疏》卷八評說：「朱子以豝為牡豕，顯悖《爾雅》，此鹵莽之過。」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0冊，頁17。清陳大章（康熙二十七年進士）撰《詩傳名物集覽》也指出：「按毛《傳》，牡恐當作牝。」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6冊，頁23。只有明季本（1485-1563）撰《詩說解頤字義》引〈秦風·駟鐵〉二章「奉時辰牡」，據此謂：「用牝者非也。」力挺朱說。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6冊，頁14。但此說遭清黃中松《詩疑辨證》反駁：「季氏謂：《詩》言『奉時辰牡』，則將為乾豆之具，用牝非也。說固有理，但春田除害稼之獸，當不論牝牡，俱在所除之中也。」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88冊，頁72-73。今人黃忠慎將此二「豝」字都譯為「母豬」，可見歷來所見不同。黃忠慎：《詩經全注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2008年），頁72、363。

(二) 不用朱說，而用鄭《箋》

〈采蘋〉詩旨，〈序〉以為：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共祭祀矣。」朱熹對此〈序〉無注，雖是無注，但實際上則是持「此〈序〉稍平」的看法⁷⁵，所以他認為這是「南國被文王之化，大夫妻能奉祭祀，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」的詩⁷⁶。然而太庾並不因此而抄錄此說，卻抄錄鄭《箋》「古者，婦人先嫁三月，祖廟未毀，教于公宮。祖廟既毀，教于宗廟。教婦德、婦言、婦功、婦容，教成之祭，牲用魚，芼用蘋藻。……蘋之言賓也，藻之言操也。婦人之行，尚柔順，自潔清，故取名以為戒」的說法⁷⁷。這除了如上所述，太庾刻意避開朱熹「被文王之化」不錄的原因之外，恐是太庾認為鄭《箋》詳細敷衍〈序〉的解釋，更為貼近自己的想法吧！

另外，在三章「于以奠之，宗室牖下」的「牖下」，朱熹解為「室西南隅，所謂奧也」。毛《傳》無解，鄭《箋》解釋為「牖下，戶、牖間之前」，其下更引申曰：「祭不於室中者，凡昏事，於女禮，設几筵於戶外，此其義也歟。宗子主此祭，維君使有司為之。」⁷⁸太庾於此也不用朱說，全抄鄭《箋》之說。其實，朱熹之解也是藉用鄭玄注《儀禮·士喪禮》：「燭升自阼階，祝執巾，席從，設於奧，東面。」及《儀禮·少牢饋食禮》「司宮筵於奧」，謂：「室中西南隅，謂之奧。」而來⁷⁹。

再者，〈甘棠〉三章「蔽芾甘棠，勿翦勿拜」，其中「拜」字，毛《傳》無解。朱熹訓為「屈」，認為從首章「勿砍伐其條榦」，到二章「勿攀折其條榦」，是「愛之愈久而愈深也」的表現，所以到了三章更是保護到「勿弄屈（彎）其條榦」的地步。這解釋給人有時間上前後的感覺，由朱熹「愛之愈久而愈深」的注解可知。在程度上則是由輕到重。但是太庾同樣不用朱說，而抄鄭《箋》之說，解為

⁷⁵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357。朱熹在《詩序辨說·樛木》謂：「此〈序〉稍平，後不注者放此。」可知矣。

⁷⁶ 同前註，頁413。

⁷⁷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39。此錄中與《箋》之原文「教于宗室。教以婦德」、「藻之言操也」、「自潔清」略不同。

⁷⁸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40。

⁷⁹ [漢]鄭玄：《儀禮注疏·士喪禮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，第102冊，頁452；《儀禮注疏·少牢饋食禮》，頁577。

「拔」。從毛《傳》解首章「伐」為「擊」（二、三章無解），到鄭《箋》三章解為「拔」（一、二章無解），大致可知其言指對當時還很小的甘棠樹之保護，並無時間上前後的差異，以及程度上輕重的不同。這可以參考太庾的老師春臺對此的看法，春臺認為首章曰「勿伐」，二章曰「勿敗」，三章曰「勿拜」，換韻而已，並沒有像朱熹所說的那樣「勿敗重於勿伐，勿拜又重於勿敗」。春臺更反問說：「果如其（朱熹）說，則末句芟、懇、說，亦有輕重乎？鄭《箋》云：『拜之言拔也。』是則拜重於伐，而言勿拜於卒章，何哉？」⁸⁰太庾也與其師有同樣的看法，所以不用朱說，而用鄭《箋》。以上兩小節所論，確實是像村山所言：「其間也有時而代之以毛、鄭之說」的情況，但是以下兩小節與村山所言：「全書無引用他書。」則略有出入。

（三）不用朱說，而用《詩本義》等書

朱熹解〈關雎〉首章「關關雎鳩」時，對雎鳩鳥進行了如下的解釋：

雎鳩，水鳥，一名王雎，狀類鳧鷖，今江、淮間有之。生有定偶而不相亂，偶常並遊而不相狎，故毛《傳》以為「摯而有別」，《列女傳》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，蓋其性然也。⁸¹

太庾的注釋則成了：

雎鳩，王雎，狀似鷹，赤黑色，曲嘴、深目，目上骨露，好在水上捕魚而食，鳥之猛摯者也，生有定偶而不相亂，偶常並遊而不相狎，又性好峙立，每立更不移處，其貞固而有別如此。⁸²

在這一段抄錄文中，太庾只抄錄朱熹所言「雎鳩，王雎」、「生有定偶而不相亂，偶常並遊而不相狎」部分而已。其他如「深目，目上骨露」是抄自《毛詩注疏》或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；「捕魚而食，鳥之猛摯者也」則抄自《詩本義》卷一或《詩傳名物集覽》卷一；「性好峙立，每立更不移處」則抄自北宋陸佃（1042-1102）《埤雅》卷七〈釋鳥〉解釋「雎鳩」的句子。

⁸⁰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頁5。

⁸¹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402。

⁸²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6。

(四) 不用朱說，而用《前漢書》等書

與上例相同的地方，朱熹解「在河之洲」的「河」時，非常簡單扼要地說：「河，北方流水之通名。」太庾則不用其說，而詳細地解釋如下：

河，水名。有兩源，一出蔥嶺，一出于闐，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蔥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，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為中國河，千里一曲一直，轉東入海，水之至大者也。⁸³

在這一段引文中，至「為中國河」引自班固《前漢書》卷九十六上〈西域傳·上〉；「千里一曲一直」引自《爾雅·釋水》；「水之至大者也」引自清張伯行(1651-1725)《居濟一得》卷七〈閉駱馬湖竹絡壩〉「黃河，水之至大者也」的句子。

其他如〈樛木〉首章「樂只君子，福履綏之」其中「只」字，除了使用朱熹注為「語助辭」之外，也引用《春秋左傳注疏》(卷三十一)中引〈小雅·采芣〉四章「樂旨君子，殿天子之邦」詩句，謂：「《春秋傳》作旨，注云，旨，美也。」其實，此說並非來自杜預之《注》，而是孔穎達之《疏》。又如〈騶虞〉二章「彼茁者蓬，壹發五豝」依朱熹解「蓬，草名」之後，自引《說苑》(卷十)「我〔筆者案：應為秋之誤〕蓬惡於根本，而美于枝葉」之句，以詳解蓬草「蓋草之根易斷，而隨風飄轉者」。以上所述，可以作為太庾的《詩經述》並非只有抄錄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而已的旁證。

五、不用朱說而用己說

太庾《詩經述》，雖然以抄錄朱熹《詩集傳》為主，但實際上卻是時有己見，不與朱熹同調。以《詩經述·二南》而言，朱熹有注，但太庾不用朱說，改用己說的情形共有八十四處。茲就此現象略述一、二如下：

〈卷耳〉詩中各章有關「我」是指何人的解釋，各家頗為分歧。〈序〉謂：「〈卷耳〉，后妃之志。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，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」毛《傳》以此認為首章「嗟我懷人」的「我」是指后妃，所以有「思君子，官賢人」的解釋。二章以後無解「我」字，可知都是指后妃而言。《正義》謂：「此不解者，以詩主美后妃，故不特言也。」此

⁸³ 同前註，頁 6-7。

說得之。然而二章「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」的前一個「我」，鄭《箋》引申為「我使臣也」；後一個「我」，引申為「我君也」。雖然都是以后妃的立場敘述「我使臣的馬病了」，「我君子酌其金罍」，但是以鄭《箋》的解釋來看，二章詩句中的前一個「我」是「使臣」，後一個「我」是「君子」。三章句法同於二章，四章「我馬瘠矣，我僕痛矣」中的二我都是指使臣而言。如此就鄭《箋》而言，〈卷耳〉一詩中同一「我」字，就有后妃、使臣、君子等三個不同的解釋。所以朱熹在《詩序辨說》中批評說：「然曰：『嗟我懷人』，則其言親暱，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。且首章之『我』，獨為后妃。而後章之『我』，皆為使臣。首尾衡決，不相承應，亦非文字之體也。」⁸⁴ 因此，朱熹在《詩集傳》中認為首章的「我」是指后妃，二章以後的「我」是指后妃「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，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，則馬罷病而不能進。於是且酌金罍之酒，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。」這解釋看似與毛《傳》相同，然毛《傳》言之過簡，給人有后妃親臨登「崔嵬之山」等等作為的實像。朱熹明指「託言」，則知二、三章只是想像中的影像而已。由以上的分析來看，毛《傳》、朱《傳》全指后妃，鄭《箋》則指三個不同人物，所以朱熹「後章之我，皆為使臣」的指控，似亦不盡然全對。但是太庾認為首章的「我」是指婦人自我，亦即使臣之妻，二章以後的「我」是指使臣自我⁸⁵。這與前三者所解釋的不完全相同，可以視為是太庾的自說。

〈野有死麕〉三章，朱熹以為此章之章旨「乃述女子拒之之辭。言姑徐徐而來，毋動我之悅，毋驚我之犬，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。其凜然不可犯之意，蓋可見矣。」⁸⁶ 朱熹會如此認為，是因為朱熹於此詩篇首章之章旨謂：「南國被文王之化，女子有貞潔自守，不為強暴所汙者。」⁸⁷ 所以與三章前後聯繫而有此說。然而太庾卻不以為然。他先從狗這種動物的習性著眼，認為狗有見生人靠近必吠，而促使主人

⁸⁴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357。同樣的批判，在《朱子語類》中也可以看得到朱熹說：「〈卷耳〉之〈序〉以『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』，為后妃之志事，固不倫矣！況詩中所謂『嗟我懷人』，其言親暱太甚，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！」《朱子語類》卷 80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，第 17 冊，頁 2746。黃忠慎謂：「朱子所說的『嗟我懷人』之親暱之言，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，這個評論和歐陽修所說的『婦人無外事，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』，都是謬評。」黃忠慎：《朱子詩經學新探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2002 年），頁 19。

⁸⁵ 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15-16。

⁸⁶ 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頁 419。

⁸⁷ 同前註，頁 418。

注意，所以解為「狗善守夜，有姦人必吠焉」。再就女子的舉動分析，認為女子要對方動作切勿粗暴，免得驚動了狗兒，因吠聲而引起他人的注意，所以他解為「言汝男子姑徐徐而來，毋妄動我之帨，恐犬見其發揚而吠之，故曰無使彪也吠，皆微行懼人之辭也」⁸⁸。以此認為，非如朱熹所言「乃述女子拒之之辭」，而是正與之相反地允許男子的邀約。假如以朱熹「貞潔自守，不為強暴所汙」的說法，似乎與詩句的情境有落差，因為正如太庾所解「狗有姦人必吠焉」，則對女子人身安全而言，應該較有保障才是，然而女子卻沒有意思要讓自己的狗有此動作，反過頭來要對方不要讓狗發現。所以太庾不加以抄錄，改用自己的見解。

六、結語

如上所述，本文限定在〈二南〉二十五篇詩，針對《詩經述·二南》各詩篇與《毛詩》、《詩集傳》的對比、爬梳、分析，證實《詩經述》不只抄引朱熹《詩集傳》而已，其實也有引用他書，而且也並非全無新見的著述。本文進而探討太庾根據朱熹《詩集傳》抄錄著作《詩經述》一書，雖然太庾處於當時古學派批判朱子的一片撻伐聲中，但他並沒有像其他古學派學者那樣激烈聲討，而是選擇抄錄朱熹《詩集傳》。既然以朱熹《詩集傳》為抄錄對象，一般而言，理應以《詩集傳》的內容為主，然而太庾的《詩經述》並不如此處理，而是幾近刻意地多處不抄錄，而這些沒有被抄錄的部分，卻往往又是朱熹《詩集傳》最具特色的觀點。

由此可見身為古文辭學派的太庾，正是以不錄的方式，刻意刪去朱熹《詩集傳》中與叶韻、勸戒、《大學》「八德目」、特定人物、性理之學等有關的論述，用以傳達他對朱熹《詩集傳》的無言批判。這種不錄的處理方式背後，雖然有著師訓的批判痕跡，以及當時古文辭學派批朱風氣使然；只是其師春臺顯而批之，太庾卻是隱而不錄，師徒兩人面對朱熹《詩集傳》，批判方式截然不同，形成有趣的對比。

朱熹《詩集傳》中明明有注釋，太庾卻不用朱說，改用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的地方頗多，另外也引用了《詩本義》、《毛詩注疏》或《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》、《詩傳名物集覽》、《埤雅》、《爾雅》、《春秋左傳注疏》、《前漢書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居

⁸⁸ 以上二引文，赤松太庾：《詩經述》，頁 56。

濟一得》等書，甚至有不少地方還用自己的觀點。

經太庾去文王化之後的《詩經述·二南》詩篇呈現出來的整體樣貌，最具特色的應該就是太庾在抄錄朱熹《詩集傳》的同時，有意識的植入了《詩序》的思想，最終成了軀殼雖為《詩集傳》，精神卻是回歸到古文辭學者擁護的《詩序》思維，這當該是太庾抄錄《詩集傳·二南》詩篇的真正目的。

如果把這種「著述」方式放在當時古文辭學開始走下坡，折衷學正興起的學術脈絡上思考，則這種「著述」方式的呈現，可以視為太庾反映時代趨勢所做的一種嘗試。亦即太庾察知折衷學的流行趨勢，試圖嘗試折衷新舊注，因而把《詩序》的思想植入朱熹《詩集傳》中，以完成《詩經述》的纂著。這也正可以說明《先哲叢談》會對太庾之學評為「不專主漢、宋，而自成一家之言」之故。總之，《詩經述》的「著述」方式在日本的《詩經》詮釋史上，可謂前所未見，可惜學術界至今無人為此書做出專論，以致使此書未能為世所知。本文針對《詩經述·二南》各詩篇的對比、爬梳、分析，提出此研究結果，或有助於日本《詩經》詮釋學的理解於萬一，此即本文研究此書的意義及價值所在也。

徵引書目

- 朱 熹：《詩經集註》，臺北：群玉堂，1991年。
- _____：《朱子語類》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第17冊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_____：《詩序辯說》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第1冊。
- _____：《詩集傳》，收入朱傑人校點：《朱子全書》第1冊。
- 季 本：《詩說解頤字義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86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。
- 林慶彰：〈朱子《詩集傳·二南》的教化觀〉，收入鍾彩鈞主編：《朱子學的開展·學術篇》，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2002年，頁53-68。
- 姚 炳：《詩識名解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86冊。
- 張文朝：〈日本儒學史（六）：江戶時代之儒學（一）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6輯，1999年6月，頁267-294。
- _____：〈日本儒學史（七）：江戶時代之儒學（二）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11輯，2003年6月，頁249-264。
- _____：〈太宰春台的詩經觀〉，《經學研究論叢》第14輯，2006年12月，頁151-184。
- _____：〈荻生徂徠の詩經觀について〉，《中国哲学論集》第31、32合併號，2006年12月，頁97-120。
- _____：〈伊藤仁斎の詩經觀について〉，《九州中国学会報》第45卷，2007年5月，頁107-121。
- _____：〈日本江戶時代（1603-1868）儒學各派創始者思想述介〉，《儒學研究論叢》第2輯，2009年12月，頁27-45。
- _____：〈渡邊蒙菴《詩傳惡石》對朱熹《詩集傳》之批判——兼論其對古文辭學派《詩經》觀之繼承〉，《漢學研究》第32卷第1期，2014年3月，頁173-208。
- 陳大章：《詩傳名物集覽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86冊。
- 陳志信：〈理想世界的形塑與經典詮釋的形式——以朱熹《詩集傳》對〈二南〉的

- 詮釋為例》，《漢學研究》第 21 卷第 1 期，2003 年 6 月，頁 279-306。
- 陳鴻儒：《朱熹詩韻研究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2 年。
- 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 182 冊。
- 黃中松：《詩疑辨證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 88 冊。
- 黃忠慎：《朱子詩經學新探》，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2002 年。
- _____：《詩經全注》，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，2008 年。
- 馮復京：《六家詩名物疏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 80 冊。
- 鄭 玄：《儀禮注疏》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 102 冊。
- 久須本文雄：《日本中世禪林的儒学》，東京：山喜房佛書林，1992 年。
- 土田健次郎：〈伊藤仁齋の詩經觀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 6 號，1981 年 6 月，頁 13-19。
- 內田 旭：〈濱松處士渡邊蒙菴に就て〉，收入靜岡縣鄉土研究協會編，《靜岡縣鄉土研究》第 15 冊，1941 年 4 月，頁 92-104。
- 太宰春臺：《朱氏詩傳膏肓》，收入關儀一郎：《日本儒林叢書》第 11 冊，東京：鳳出版，1978 年。
- 白石眞子：〈太宰春臺の「讀詩」の要領——《論語古訓外伝》を通して見る《詩》と孔子〉，《漢文学解釈与研究》第 7 輯，2004 年 12 月，頁 133-161。
- _____：〈太宰春臺の「詩論」〉，《東方学》第 114 輯，2007 年 7 月，頁 84-100。
- _____：〈渡邊蒙庵《詩傳惡石》考——徂徠、春臺「讀詩」の系譜〉，《和漢比較文学》第 39 號，2007 年 8 月，頁 26-41。
- _____：《太宰春臺の詩文論——徂徠学の繼承と転回》，東京：笠間書院，2012 年。
- 石本道明：〈太宰春台の詩觀について——徂徠学の繼承をめぐって〉，《日本文學論究》第 44 冊，1985 年 1 月，頁 79-86。
- 伊藤仁齋：《語孟字義》，收入吉川幸次郎、清水茂：《伊藤仁齋·伊藤東涯》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71 年。
- 安江良介發行：《補訂版國書總目錄》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1989 年。
- 竹林貫一：《漢學者伝記集成》，東京：名著刊行會，1978 年。
- 村山吉廣：〈渡邊蒙庵の《詩傳惡石》について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 2 號，1975 年 5 月，頁 12-17。
- _____：〈詩經關係書目解題（一）〉，《詩經研究》第 5 號，1980 年 4 月，頁 18。

- 赤松太庾：《孝經述》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，1756年刊本。
_____：《詩經述》，寫本，書寫年不明。
- 足利衍述：《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》，東京：有朋書房，1970年復刻版。
- 和島芳男：《中世の儒学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65年。
_____：《日本宋学史の研究》，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1988年。
- 東條 耕：《先哲叢談》後編卷5，1829年刊本。
- 長澤孝三：《漢文學者總覽》，東京：汲古書院，1992年。
- 高橋博巳：〈徂徠学における《詩》について〉，《日本思想史研究》第5號，1971年5月，頁32-41。
- 淺山佳郎：〈服部南郭の「詩」の意識：徂徠と南郭の詩經觀をめぐって〉，《上智大学国文学論集》第18號，1985年1月，頁143-160。
- 清水 徹：〈東洋の學藝 伊藤仁齋における《詩經》觀〉，《東洋文化》第100號，2008年4月，頁12-26。
- 荻生徂徠：《經子史要覽》，收入島田虔次編：《荻生徂徠全集》第1卷，東京：みすず書房，1973年。
- 渡邊蒙菴：《詩傳惡石》，1739年手抄本。
- 關儀一郎：《近世漢學者傳記著作大事典》，東京：琳瑯閣書店，1981年第4版。